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八本，第二分
出版日期：民國八十六年六月

清初思想趨向與《劉子節要》 ——兼論清初蕺山學派的分裂

王汎森*

本文是藉一本並不存在的書《劉子節要》的一些蛛絲馬跡，推測因它引起的思想爭論究竟在清初思想史中有何具體的涵義？希望對於理解劉宗周學說的要旨和清初學風變化的情狀，乃至對理解《劉子全書》編纂的要領，有所幫助。文中指出，清初原有刪改王門後學文獻以求合於復興的朱子學的趨勢，本文為這學術趨勢提供了一個描述。論文指出時人淡化劉宗周和朱子學說的矛盾的「意」的思想，是代表一種壓抑王學以求合於朱子學復興的傾向，並討論這一趨勢與清代官方意識型態之成立的關係。文中並分析劉門幾派對於劉學宗旨的不同詮釋及其各自用心所在。

關鍵字：清初思想史 《劉子節要》 惺仲昇 官方意識型態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惲仲昇(1601-1678)是明末理學大儒劉宗周的重要弟子。在劉宗周自殺殉國之後，他的學派內部呈現分化與衝突，故有人說「蕺山身後，弟子爭其宗旨」。¹黃宗羲自己也說「子劉子既沒，宗旨復裂」。²

而惲氏與同門黃宗羲等人在思想上的分歧，更是當時江浙思想界的一件大事。惲氏文集罕見，³連他當時最受爭議的《劉子節要》一書也無法尋得，⁴所以當我們讀到一些與這次爭論有關的零星材料時，竟對他們當日爭執的主題感到茫然。

黃宗羲顯然非常看重這次爭論，所以將它寫進《明儒學案》的〈序〉中。他說：

歲己酉，毘陵惲仲昇來越，著《劉子節要》。仲昇，先師之高第弟子也，書成，義送之江干，仲昇執手丁寧曰：今日知先師之學者，惟吾與子兩人，議論不容不歸一，惟於先師言意所在，宜稍為通融。義曰：先師所以異於諸儒，正在於意，豈可不為發明？仲昇欲義敘其《節要》，義終不敢。⁵

¹ 孫靜菴，《明遺民錄》（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頁93。

² 黃宗羲，《黃宗羲全集》，以下簡稱爲《全集》（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無出版年代），冊十，頁304。

³ 師大藏有東北大學寄存之《惲遜庵先生文鈔》，係清末惲氏族孫託繆荃孫代印的，只有薄薄數十頁，內容亦甚貧乏，與本文主題相關之材料極少。

⁴ 《劉子節要》一書共十四卷，清代汪憲編《振綺堂書錄》（民國十六年排印本）卷三，頁17說《劉子節要》二冊，十四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1）子部、儒家類存目二頁516中錄其每卷目錄：「一、道體，二、論學，三、致知，四、存養，五、克治，六、家道，七、出處，八、治體，九、治法、十、居官處事，十一、教人之法，十二、警戒改過，十三、辨別異端，十四、總論聖賢，每一類爲一卷」。這十四類的安排與名稱顯然依倣朱子的《近思錄》，仔細比對，可以發現兩者只有些許的文字差異，那麼它自然也反映了惲氏本人傾向朱子的態度。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七世紀初葉，由《近思錄》之激勵而有一系模仿《近思錄》十四卷模式的輯錄出現，高攀龍的《朱子節要》、江起鵬之《近思補錄》、孫承澤之《學約續編》、劉源淥之《近思續錄》、朱顯祖之《朱子近思錄》、汪佑之《五子近思錄》、張伯行之《續近思錄》、《廣近思錄》等等，見陳榮捷，〈性理精義與十七世紀之程朱學派〉，《朱學論集》（台北：學生書局，1982），頁408-9。我曾到江浙一帶尋訪此書，但此書無法尋得，袁爾鉅的《蕺山學派哲學思想》（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3）中也說無法尋得該書，見頁387。在新出《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子部儒家類中亦未見該書。

⁵ 《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9-10。

從這段話看來，惲、黃二人在己酉，也就是康熙八年(1669)對其師劉宗周思想的詮釋已有異議，而儘管惲氏再三勸說，黃氏皆不為所動，甚至不願序其書，而整個爭論之所起，是在惲氏所輯《劉子節要》。

惲仲昇希望黃氏序其節要，並說當時通曉其師說的就剩他們兩人，「議論不容不歸一」，則是希望當時正在大力宣傳劉氏學說的黃氏能支持他對劉氏學說之詮釋。惲、黃二人原先並不熟悉。如果不是黃氏當時大加宣揚鼓倡劉氏學說，惲氏或許不會有此舉。而如果不是黃氏堅持自己忠實於劉氏的詮釋，後人寫他時不會用下述這一段話：

子劉子夢奠之後，及門之士多歸忠節，海內遂無知其學者。先生於故牘理其緒言，刻之行世，使海內知子劉子之學，與陽明同而異，異而同也。⁶

從《劉子節要》書名及惲仲昇的思想傾向看來，《劉子節要》之體例顯然是模仿惲氏所尊仰的高攀龍所輯之《朱子節要》，而主要目的也是想提供一個簡便的集子，方便天下人了解其師之思想。從黃氏《明儒學案》的序文中所言看來，他與惲仲昇的主要分歧是對《節要》中涉及劉宗周「意」的哲學之詮釋不能同意。

「意」的哲學是劉宗周一生思想重點，它一被提出，爭議紛紜的情形，黃氏在《思舊錄》中寫劉宗周的條下說：

先生（劉宗周）以意非心之所發，則無不起而爭之。⁷

不過黃氏本人是贊成「意為心之所存」之說的，⁸但是陳確似乎便不談此說，因為他認為整個《大學》是有問題的，所以《大學》「誠意」的宗旨也是靠不住的，根本不必再談意為心之所存或所發了。黃宗羲曾對此作了相當簡要的概括：

先儒曰：意為心之所發，師以為心之所存。人心徑寸間，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不然，《大學》以所發先

⁶ 《全集》，冊十，頁609。

⁷ 《全集》，冊一，頁338。

⁸ 《全集》，冊十，頁194-5。他並且說這個思想是「唯先師獨透其宗，此意散在語錄中，門弟子知先師之學者甚少，故晦而未彰」。

所存，《中庸》以致和爲致中，其病一也。然泰州王棟已言之矣。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變，意有定向而中涵，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個不慮而知之靈體，自作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撓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若云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動念之初，念既動矣，誠之奚及？師未嘗見泰州之書，至理所在，不謀而合也。⁹

大學中先誠意後正心，如果照這個順序，那麼何以「先儒」說是在先的「意」反而是在後的「心」所發？這是一個絕大的矛盾，劉氏所以要極力主張意爲心之所存，主要是想防堵意有善有惡，及心爲無善無惡之說。他想從每一方面來論證心是純善無惡的，這是人心的本質，所以人便應該無論如何達到這一人格境界。

意如果是有善有惡，那麼，依劉氏之意，誠意的哲學便大有問題——誠其善的意，可以爲君子，但如誠其惡之意，則豈不是斷然爲小人嗎？他非得做這一個分別是有現實考慮的，一方面是認爲意如爲心之所發，而發生上述問題，則《大學》誠意的思想便大有毛病了。而他在當時便看到許多奉行陽明哲學的人，因爲自信其心，而又以心爲無善無惡，不能貞定人的本質爲善，故常稱心行惡而不能自知。

這一切都是對當時思想界道德相對主義及王學禪學化兩種風氣而來，也都是爲了闡揚他純善的哲學而來，而這正是與他早年參與成立首善書院的宗旨相一貫的。而劉宗周有關「意」的思想則相當程度地解決了這個矛盾。但爲什麼同爲劉門弟子的惲仲昇要黃氏對他們老師「意」的思想「稍爲通融」？究竟要怎樣「通融」？

由於見不到《劉子節要》一書，故我們只能從黃宗羲的一篇〈答惲仲昇論劉子節要書〉來推測。惲氏是將劉宗周思想中有特色的部份故意刪去、稀釋或模糊化，第一個引起黃氏不滿的地方即是劉氏言「意」的部分被惲仲昇刻意淡化掉了。黃宗羲形容說：

⁹ 〈先師蕺山先生文集序〉，陳初乾編，《黃梨洲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348。

自意爲心之所發之註，爛熟於經生之口耳，其與先儒牴牾者亦在此，因起學者之疑亦在此。先師《存疑雜著》，大概爲此而發，其後伯繩編書，另立〈學言〉一門，總括先師之語，而《存疑》之目隱矣。董標〈心意十問〉，史孝復〈商疑十則〉，皆因學者疑此而辨明之也。今《節要》所載，董、史〈問〉〈答〉，去其根柢而留其枝葉，使學者觀之，茫然不得其歸著之處。猶如水經爲諸水分合而作，而讀者止摘其雋語逸事，於作者之意，亦何當乎。¹⁰

從這段引文看，首先企圖隱去宗周「意」方面論點的是他的兒子劉洵（伯繩，1613-1664）。接著模糊化這方面論點的是惲氏的《節要》。惲氏書中將〈心意十問〉與〈商疑十則〉這兩份極能闡明「意」之思想的文字「去其根柢而留其枝葉，使學者觀之，茫然不得其歸著之處」。

劉宗周的另一特色是《人譜》，但這也被惲仲昇所淡化了。¹¹ 黃宗羲在給惲仲昇的信中說：

《人譜》一書，專爲改過而作，其下手功夫，皆有塗轍可循。今《節要》改過門，無一語及之，視之與尋常語錄泛言不異，則亦未見所節之要也。¹²

這一封信，可能是己酉(1669)兩人見面時所寫。他責備惲氏書中未特提《人譜》。在這一方面，劉洵的態度與惲仲昇不同，劉氏死前仍諄諄告誡要門人守住「人譜」改過之學。¹³

¹⁰ 〈答惲仲昇論劉子節要書〉，《黃梨洲文集》，頁448。

¹¹ 惲仲昇的講友張履祥認爲戴山《人譜》有背於程朱，參謝國楨，《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518。

¹² 同前書，頁449。

¹³ 袁爾鉅，《戴山學派哲學思想》，頁395。有一種說法認爲惲仲昇後來對黃宗羲的詮釋讓步。《陳確集》的編校者有一條案語，說惲氏「面對意爲心之所存一說心懷疑問。梨洲爲之剖析探究，始爲信服。」（頁125）這一段話沒頭沒尾，且未提出任何根據。此處試勾稽一些史料加以討論。

在黃、惲二人河干握別(1669)五年後，惲仲昇有一封信給梨洲，上面說：

「河干握別，倏已五年…先師《節要》，敝鄉學者亟欲見其書，遂謀付梓，所乏紙價，不能廣爲流通，今卻寄一部…老師之學，同門中惟吾兄能言之，或作序、或書

我們不禁好奇：惲氏何以和劉洵一樣急急刪去他們老師一生最重要的哲學主張，而一味求合於「先儒」的「意爲心之所發」？這裡的「先儒」是誰？爲什麼違反「意爲心之所發」即得罪了「先儒」呢？如果不能解決此問題，則無法了解刪去與「先儒」相反對的意見其實正反映了一代學風的變化。

此處之「先儒」可以是朱子，也可以是王陽明。因爲意爲心之所存，非所發的觀點，對朱子與王陽明都不利。王陽明《傳習錄》中有幾處提到心之所發便是意，則朱子「意」爲心之所發之思想基本上是被陽明所繼承的。所以董允璘讀到劉宗周的文章後會寫《劉子質疑》，懷疑劉宗周「意」的哲學傷害了王學的傳統，但是黃宗羲很快地便化解了這個質疑，並使得董氏相信劉、王之學是

後，惟尊意。吾兄所爲狀，欲采入附錄中，並望惠教。《節要》中有可商榷處，更希一一昭示。」（《黃宗羲全集》，冊十一，頁395。）

由此信看來，惲氏當時欲在武進流通《節要》，先將付印稿寄黃氏，請他作序或書後，並想將黃氏所爲〈子劉子行狀〉收爲附錄。我們看不出在兩人分手五年之間，惲氏是否對《節要》內容進行改動。不過，如果未曾改動，他應該也會知道，黃氏顯然會和五年前一樣拒絕作序，就不煩再有「或作序，或書後」的請求了。而黃氏〈子劉子行狀〉與惲氏的《節要》及〈行狀〉皆相矛盾，現在希望將黃氏所爲〈行狀〉收爲附錄，不管《節要》內容是否已改，即已多少表示一種新的態度。黃氏顯然未曾作序，不過他的〈子劉子行狀〉應該是被收入《節要》了。在〈南雷詩文集附錄〉中，收有施博給黃的一封信，說：

「昔年惲仲昇兄便道過訪同門張考夫兄，博幸與聞聲咳，且得誦所作先生傳，詳盡有體，正可相與共肩師傳。」（《黃宗羲全集》，冊十一，頁394。）

此信中有「先師（劉宗周）歿已三十年」一語，足見應在一六七五年，正是惲氏與黃氏河干握別五年之後一年，當時《節要》當已刊成，書後附黃氏的〈行狀〉，在惲、施見面時，施氏得贈一冊。

從以上材料看起來，只能說惲氏將黃氏的〈行狀〉與自己的《節要》並存，並不能證明惲氏後來捐棄自己的說法。《明儒學案》卷六十二〈蕺山學案〉有一段話：

「及《節要》刻成，緘書寄義，曰：『子知先師之學者，不可不序。嗟呼，義豈能知先師之學者？…然觀日初〈高劉兩先生正學說〉…以此觀之，日初亦未便知先師之學也。使其知之，則於先師言意所在，迎刃而解矣。此義不序《節要》之意也，惜當時不及細論，負此良友。』（頁1507-8）

〈蕺山學案〉完成於一六七六以後，此時已過了惲氏將《節要》寄請黃氏作序之時，而《學案》中清楚寫著他仍「不序《節要》。」而兩年後，也就是一六七八，惲氏便死了。

二而一、一而二，不可分割的，董氏甚至以「劉子學者」自名。¹⁴

但是陽明的全部《傳習錄》中，並無「意爲心之所發」這一句。¹⁵ 不像朱子是在《四書集註》中《大學》的一開始便有此一句，而且幾百年來列爲科舉功令必讀之物。所以當時人認爲劉宗周是傷害了朱學，對於其言意爲心之所存更認爲：

先生篤實類朱文公，而言誠意慎獨與朱不合。¹⁶

蔣學鏞編的《鄭志稿》也是說：

南雷宗念台劉公之傳，以意爲心之所存，非所發；學者習考亭舊說，多未信。¹⁷

足見對「意爲心之所存」一語不滿意的是「習考亭舊說」的一般學者，不是陽明學者。劉宗周自己也認爲他「意爲心之所存」的哲學得罪了程朱。一六四三年〈答史子復書〉中說：

意爲心之所發，古來已有是疏，僕何爲獨不然…總之，存發只是一幾，故可以所存該所發，而終不可以所發遺所存。則《大學》誠正一關，終是千古不了之公案，未可便以朱程之言爲定本也。¹⁸

足見劉宗周也認爲他挑戰的是「以朱程之言爲定本」。外人印象，及作者主觀意圖皆是以程朱爲對象，則其針對性是很清楚的了。

前面已經說過「意爲心之所發」是朱子《四書集註》中一段極重要的文字。在朱子思想系統中「意爲心之所發」一句佔有重要地位。如果說意爲心之所發，則意絕非純善無惡，而是有善有惡。但在劉宗周的系統中，認爲如果主張意有善有惡，則人的虛靈之心便隨善惡流轉而無一至善的主宰。他主張「意」是心之所存，「意」是至善的，而且是心之主宰，是定盤針，人心便不至在善惡之間搖擺了。

¹⁴ 《全集》，冊十，頁454。董允璘認爲「存固存，而發亦存也」，見蔣學鏞，《鄭志稿》，頁518。

¹⁵ 這是查索九州大學哲學部所編《傳習錄索引》的結果。

¹⁶ 邵廷采，〈明儒劉子戴山先生傳〉，《思復堂文集》，頁76。

¹⁷ 蔣學鏞，《鄭志稿》（《四明叢書》，第三集），頁518。

¹⁸ 《劉子全書》，頁1412。

朱子強調已發、未發之別，而凡屬已發，即有後天染雜，所以「意爲心之所發」，則「意」爲已發的可有染雜的部份，而理想的狀態只能是慎求未發的中和狀態。劉宗周將之修改成「意爲心之所存」，即是強調即發即存，體用不二，所以他曾與人有如下一段問答：

問：意屬已發，心屬未發否？曰：人心之體，存發一機也。心無存發，意無存發也。蓋此心中一點虛靈不昧之主宰，嘗嘗存，亦嘗嘗發。¹⁹

由此看來，意之爲心之所發或所存不只是心有無定盤針的問題；主張「意爲心之所存」還是對朱子以來「人自有未發時」之說的批判。朱子認爲已、未發是兩件，而劉宗周認爲「已發」「未發」是一件事，「常以存」、亦「常以發」。將已發、未發合而爲一是劉氏合兩個分開境界爲一個境界的觀點之一環。在董塲所編劉宗周《年譜》中錄有一段劉洵案《存疑雜著》的話：

先儒言道分析者，至先生悉統而一之。先儒心與性對，先生曰：性者心之性。性與情對，先生曰：情者性之情。心統性情，先生曰：心之性情。分人欲爲人心，天理爲道心，先生曰：心只是人心，道心者人心之所以爲心。分性爲氣質、義理，先生曰：性只有氣質，義理者，氣質之所以爲性。未發爲靜，已發爲動，先生曰：存發只是一機，動靜只是一理。²⁰

而劉氏「意」的觀點與此等由二境界歸於一境界有關。劉氏「意」爲善且爲心之所存之說，使得心有一最高的定盤主宰，不再在有善有惡的念起念滅上作攔截工夫，而是直接有一最高的純善的主宰在，那麼，道心、人心等就不再兩分，而是一個了。

「意爲心之所存」以純善的「意」爲心之定盤針，也直攻良知四句教中的第一句「無善無惡心之體」。明季許多學者大力批評「無善無惡」，認爲應該「首善」（「首善書院」的創立即是一代表）。東林學派倡之尤力，而飽受東林學風薰陶的劉宗周正是以此新觀點來支持他的新哲學主張。他認爲，心是一只

¹⁹ 〈答董生心意十問〉，《劉子全書》（台北：華文書局，無出版年代），頁540。相關討論可參考戴君仁，〈心學家論意〉，《大陸雜誌》44：4，頁200-202。

²⁰ 劉洵，《年譜》，在《劉子全書》，頁3666。

徑寸虛體，如果是無善無惡，則必有惡作，故必須有一定盤針為主於其間。他認為陽明之所以主張有善有惡之「意」，也是因他跳不出朱子的樊籬，被朱子「意爲心之所發」一說所限。

由以上可以看出，劉宗周「意」的思想是兼斥朱王的，但是整體來說，與朱子矛盾最大，尤其是在意爲心之「所存」或「所發」這一問題上，兩人真是南轅北轍。所以「意爲心之所存」是針對朱子《四書集註》「意爲心之所發」一句而發，前面黃宗羲有「先儒之注爛熟於口」一句話，所謂「先儒之註」當然是指《四書集註》，而明末清初人又多以劉氏「意」的哲學爲明季王學的代表性主張，所以當有人想將它刪去或淡化時，其實代表一種壓抑由劉宗周所代表的王學，以求合於朱子學復興的傾向。

爲什麼要求合於朱子？這一方面是劉門弟子中傾向於嚴明整肅的一派思想興起，另方面是學派外部由王返朱的壓力。²¹ 而這兩者又常結合在一起。

劉宗周死後，劉門弟子中有一支傾向於同情或支持朱子學，劉洵、張履祥(1611-1674)等正是這一新趨向的領導者，而憚仲昇是其重要助力。劉伯繩的思想始終傾向紀律化。他所最擔憂的一直是劉門內部中轉向禪學的傾向。故他在作爲其父的助教時，便曾刻意引進一批持論比較嚴謹的弟子到劉宗周的身邊。黃嗣艾《南雷學案》說：

忠正公（劉宗周）講學越中，一時承風接響者以想像爲本體，權謀爲作用，忠正公之言，格於浸淫之僻說而不相下。先生憂之曰：此係禪門種草，寧可移植於吾室乎？於是推擇王業洵，王毓著，及南雷公等十數人，進之爲弟子。²²

在明亡而劉宗周自殺之後，劉伯繩居小樓二十年，杜絕人事，雖通家故舊亦所竣拒。²³ 這段時間內，黃宗羲並不常與他見面。²⁴ 但在他杜門幽居的日子中，有幾個人是常相見面的，史孝咸、憚仲昇便是。²⁵ 由見面與不見面，其實可以

²¹ 詳見後面的討論。

²² 《南雷學案》，《清代傳記叢刊》本（台北：明文書局，無出版年代），頁250。

²³ 同前書，頁251。

²⁴ 見黃氏《答劉伯繩問律呂》，《黃梨洲文集》，頁416-418。

²⁵ 徐世昌，《清儒學案》（台北：世界書局，1979）卷2，頁67。

看出他當時思想趨向，基本上與惲仲昇為近，都同情當時學術界由王返朱的空氣，而與自認堅持劉氏之學的黃宗羲疏遠。《明遺民錄》說「念台之子伯繩，輯先人遺書，多折衷于履祥。」²⁶ 張履祥正是當時劉門弟子中轉向程朱的代表人，而劉洵在編其父文集時，不請教黃宗羲而請教張履祥，那麼他在編輯工作中有迎合朱學的傾向就不足奇了。

劉宗周死後弟子詮釋其宗旨約可分為三派。第一派是以劉洵、張履祥，吳蕃為主的傾向程朱派。大概而言，當劉洵還在世時(1613-1664)，²⁷ 稿子在劉洵手中，所以整個詮釋權握在他的手中。劉洵在一六六四年故逝後，劉宗周著作的詮釋空間才比較開放。也就在這個時候，黃宗羲對劉宗周思想的詮釋開始活躍起來。黃氏幾件與此有關的活動都發生在一六六七、一六六八年，正是劉洵死後。

劉洵對其父著述的整理與詮釋分成兩部分。第一是編遺書。第二是編年譜。此處先談遺書。劉洵似乎極力想做好詮釋其父思想的工作，所以對其遺集「一書再書」。陳確在〈別劉伯繩序〉中說他見劉洵時「問：猶有副乎？曰：有。有草本乎？曰：有。可得而盡觀乎？則皆伯繩之一書再書，而猶皇然若不足者」。²⁸ 同時劉洵也不隨便讓人看他父親的遺稿，陳確在一封給張履祥談到劉宗周的文稿在陸冰脩手裡時說：

所謂陸兄者，其冰脩乎？此兄亦有意先生之學，但浮氣未除耳，絕非世俗比，即曾見此書，亦無煩過慮。²⁹

而且當時同門師友也已經注意到劉洵對其父著述之刪訂，不是一個人的行為，而是一群人的工作。黃宗羲為《劉子全書》作的〈序〉便是這樣說的：

先師丁改革之際，其高第弟子如金伯玉、吳磊齋、祁世培、章格庵、葉潤山、彭期生、王玄趾、祝開美一輩，既已身殉國難，臬比凝塵，曩日之旅

²⁶ 孫靜庵，《明遺民錄》，頁17。

²⁷ 一說劉洵卒於康熙二年(1663)，見《明遺民所知錄》，在謝正光等編，《明遺民錄彙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1001。一說卒於康熙七年(1668)，見董瑒，《抄述》，《劉子全書》，頁1230。不過，黃宗羲，《劉伯繩先生墓誌銘》已清楚記載其卒年為甲辰(1664)，見《黃宗羲全集》，冊十，頁308。

²⁸ 《陳確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235-6。

²⁹ 同前書，頁616。

進者，才識爲不當。伯繩輯遺書之時，其言有與雒閩齟齬者，相與移書請刪削之，若惟恐先師失言，爲後來所指摘，嗟乎，多見其不知量也。³⁰

劉洵編遺書時最主要的顧問是張履祥，這是有證據可以支持的：

去春歸家錄年譜，秋間錄易抄，今春錄語錄、會語，手抄之後，輒復茫然，真可謂下愚不移。兄其何以教之乎？諸書原本或在仲木（吳蕃），或在弟處，尚容收集彙送，未敢先寄，以仲木曾有言，欲親送考夫（張履祥）兄一閱故也。年譜亦絕不敢以示人。³¹

易抄、語錄、會語，俱送考夫兄處，未返。確於先生語錄，亦略有參訂，欲私質之吾兄，非面晤不能。³²

劉洵這一群人刪改劉宗周原稿的情形一定相當嚴重，所以引來陳確的注意。陳確不時與劉氏通音問，對劉洵進行的刪削工作相當注意，曾勸他在作編輯工作時勿傷了劉宗周的原旨。在〈寄張奠夫、劉伯繩兩兄書〉中說：

年譜出繩兄手筆，自另成一書，不妨參以己見，然關係先生學術處亦自宜過慎。至於遺集言理之書，或去或留，正未易言。無論弟之淺學不敢任臆，即如繩兄之家學淵源，表裡洞徹，恐亦遽難裁定…與我見合者留之，不合者去之，然則豈復爲先生之學乎？以繩兄之明睿，萬萬無此慮，而弟猶不敢不鯁鯁過慮者，只見其不知量耳，而不能自己。³³

劉洵在康熙三年(1664)死前——「卒之夕，出篋中稿屬諸子曰，大父文千古聖學所寄，勿漫示人，俟可梓行世」。³⁴ 這段遺囑用意相當奇特。何以一定要「勿漫示人」，要「俟可梓」才行世——可梓時自然是劉洵所整輯刪訂並裝訂成帙的清稿。是不是說如果將劉子原稿及他整理的清稿「漫示人」，那麼刪削之處便無可隱了？³⁵

³⁰ 《劉子全書》，頁5。

³¹ 〈寄劉伯繩書〉，《陳確集》，頁615-6。

³² 〈寄劉伯繩世兄書〉，同前書，頁88。

³³ 同前書，頁77。

³⁴ 邵廷采，〈貞孝先生傳〉，《思復堂文集》，頁285。

³⁵ 劉洵久不出遺書也不全是爲了秘密刪訂。由於劉氏講學時間甚長，每一時期的弟子皆有記錄。所以久持遺書不刊，可以將每一時期弟子所錄的講義儘可能補齊，故陳確有一封信說：「前得子霖一函，並是開兄侍先生時所手記者，似皆宜登集，兼足以補師集之未備。…刻事誠未易草草，以此益服伯兄久持先生之集非無見也。」（《陳確集》，頁84）。

劉洵作宗周年譜兩卷，這部年譜前後有過幾個名字，先是《劉忠正公年譜》，譜後題「順治八年辛卯夏六月上浣之日不孝洵泣血拜書」，³⁶可見此譜作於一六五一年。此譜後來又題《劉忠介公年譜》，章學誠有序，改題此名是因為一七七五年雍正諡劉氏為忠介，足見此本出現在一七七五後。

劉洵於年譜稿完成後，即請吳蕃代為刪潤。吳氏是幫助劉洵刪定年譜的重要人物，³⁷他與張履祥構成一個詮釋劉宗周思想的核心。此處我們應當看吳氏的思想趨勢，才知劉洵何以找上他。

民國張鈞衡編《適園叢書》時將吳氏《祇欠菴集》兩卷收入。他在書後的跋文中對吳氏作了一番研究，說：

癸巳(1653)後，與張先生楊園及從弟志仁講求程朱正學。³⁸

這一段概括性的判斷是有所本的。《祇欠菴集》中兩篇哭山陰先生的文字，尤其是〈再告山陰先師文〉，實即朱子晚年定論式文字。吳氏想強調劉宗周「終有合於朱子之學」，³⁹認為山陰生前最後階段對陽明有疑，實際上已合於朱子，而他自稱「蕃於朱子與先生（劉宗周）之學，殆無間然矣」。⁴⁰那麼經過他刪潤之後的年譜內容之傾向可知矣。

詮釋劉氏遺書的第二派是陳確，陳氏思想在劉門子弟中另樹一幟，所以他與劉氏遺書的關係也是非常特別的。陳確是劉宗周最晚的弟子之一，他自言「確之登師門最後」，⁴¹又在〈春遊記〉中說「癸未八月始問學山陰」，⁴²癸未是

³⁶ 謝巍編撰，《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321。

³⁷ 《陳確集》「仲木有意任刪潤年譜之事」（頁616）。《陳確集》「歲壬辰(1652)二月，確與澉湖吳蕃同受先生遺集以歸，已而確嘗致書伯繩，謂蕃嘗有意任刪潤年譜之事」（頁396）。《陳確集》：「聞仲木改先生年譜已且及半，弟既未得一見，又不得持奉伯繩，如何！如何！」（頁105）。《陳確集》：「人曰：《忠節先生年譜》是仲木平生一篇絕大文字」（頁322）。

³⁸ 《祇欠菴集》（民國適園叢書本），〈跋〉，頁14。

³⁹ 同前書，頁9。

⁴⁰ 同前書，卷六，頁10。

⁴¹ 《陳確集》，頁307。

⁴² 同前書，頁207。

一六四三年，去劉氏殉國不久。他基本上認為其師花太多時間與《大學》「意」的哲學相纏鬥是不智之舉，因為《大學》是偽書。

陳確曾在一六五二年與吳蕃同至山陰受劉氏遺集以歸，一六五三年又同往校訂遺書。⁴³ 這兩次前往，發生的事並不相同，我們在〈別劉伯繩序〉這一篇文章中找到了兩段話。一六五二年那一次「確請奉其副以歸而卒業焉，而徐謀梓于同人，則弗許」。⁴⁴ 一六五三年——「越明年，春正月，確又同澈湖吳子以來，…再請其書讀之」。⁴⁵

陳確之所以欲求遺書而讀，是想輯出一些對自己修身養性有用的文字，此為其《山陰語錄》之緣起。⁴⁶ 由於他的思想自成一派，所以黃宗羲與惲仲昇等人爭得津津有味的問題，他都完全不在意。到底應該意為心之所「存」還是所「發」對他來說並無意義，所以《山陰語錄》中對他老師所矜為獨到的都「闕然」，因為他都有所懷疑：

或曰：先生言《大學》心、意、知、物，暨《中庸》喜怒哀樂已未發之旨甚詳，而私抄闕然，何也？確蓋有所心疑焉，而未敢筆也。非疑先生之言，疑《學》、《庸》之言也。⁴⁷

他根本認為要否定《大學》、《中庸》的正當性，所以他老師一生圍繞在這兩部書所創發的種種新觀點，在他看來不值得再討論，陳確〈與劉伯繩書〉中說：

弟於先生，無言不悅，惟誠意、已發、未發之說雖極精純，然弟意欲且存而不論，蓋《大學》斷是偽書，而《中庸》所言，尚多出入。⁴⁸

⁴³ 《陳確集》，頁396「歲壬辰(1652)二月，確與澈湖吳蕃同受先生遺集以歸」。《陳確集》點校者說：癸巳(1653)春，「是年正月，乾初同吳仲木至山陰，校訂《戴山先生遺書》」(頁308)。

⁴⁴ 《陳確集》，頁236。

⁴⁵ 同前註。這一次發現劉洵「則于年譜節其冗者十三，於遺書汰其言之復者，尋常酬答之無關世教者十二，已盡非昔日之元本矣，猶以為未也」，(同前引，頁236。)足證當時陳氏已知道劉洵除了去其冗複之外，還想在遺書上有進一步刪改。

⁴⁶ 陳確說：「竊欲妄輯先生語錄，擇其說之最中吾膏肓者，另寫一本，奉為私書。」(《陳確集》，頁616。)

⁴⁷ 同前書，頁396。

⁴⁸ 同前書，頁471。對劉宗周，陳確獨尊其慎獨思想。(同前書，頁396。)

對劉氏遺書詮釋的第三派是以黃宗羲為代表的陸王派。劉洵、陳確等人在為劉宗周著述進行詮釋、整理工作時，黃宗羲還未得到機會接觸比較完整的劉氏遺稿，所以基本上並未介入。黃宗羲曾在一六六六年根據他手上藏有的劉氏文章刊刻過劉子遺集。此書書名不詳，目前也未能尋獲。在這部集子中，黃氏未經呂留良許可，將他列為校對之一，與黃氏弟子並列，使得呂氏勃然大怒，覺得黃氏有將他視為弟子之嫌。我們同時也從呂留良的文字中發現，當時已有人批評黃氏所能掌握的劉氏文稿比起劉洵所擁有的非常不完整。⁴⁹ 黃宗羲獲得大量劉子遺書，並掌握解釋權，是到一六六八年左右的事，也就是劉洵死後，由他的女婿劉茂林處得到的，他的闖入，引起此下不少波瀾。

黃宗羲與劉宗周的淵源非常深，他的父親黃尊素與劉都是魏忠賢迫害的對象。黃尊素死後，當故鄉的人畏於魏黨權勢而噤若寒蟬，甚至連一個下葬的墓地都出面阻撓時，是劉宗周親往弔祭並以衣袖拭棺這一個舉動將當地一股勢焰壓了下去。⁵⁰ 黃氏因父親遺命，侍劉宗周甚早，呆在劉氏身旁亦久。不過正如他後來在回憶文字中所提到的，因為當時一心在科舉上，所以不曾用心學習劉氏之學，直到明亡，他因為曾參與抗清活動遭到緝捕，「殭餓深山，盡發藏書而讀之」，⁵¹ 才開始對劉氏學說有較深的體認。不過這只是他自己所藏的部份，並不是比較完整的遺書，否則也就不會有後來在一六六八年左右一再提到

⁴⁹ 呂留良〈復姜汝高書〉：「去歲委刻念台先生遺書，其裁訂則太沖任之，而磨對則太沖之門人，此事之功臣也。若弟者，因家中有宋詩之刻，與刻工稍習，太沖令計工之良窳，值之多寡已耳，初未嘗讀其書。今每卷之末必列賤名，于心竊有所未安。嘗讀朱子與張南軒往復論刻書事，一字一句必考存原本，其精慎如此，此所謂校讎之功也。今此書未曾一見原稿，直太沖傳本耳，未知其于原稿無一字一句之誤否？…且中述太沖語云，近日劉氏于廢簾中，又得學言若干，比今刻不止十倍，某雖不知今得之何如，然則所刻之為人刪定，而非其全體，可知矣。」，《呂晚村文集》（台北：商務印書館，1977），卷二，頁7-8。

依據徐益藩〈黃梨洲呂晚村爭澹生堂書平議〉，《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3：1（1947），頁23。此信作於一六六七（丁未）冬，則黃刊劉子文集當在一六六六，因為書是黃氏與姜希轍、姜汝高合刻的，故呂留良寫信給姜汝高，要求剷去校對之名。

⁵⁰ 見黃宗羲，《思舊錄》，《黃宗羲全集》，冊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頁338。

⁵¹ 〈惺仲昇文集序〉，《黃宗羲全集》，冊十，頁4。

的「子劉子遺書以次漸出」——當日受學於黃氏的李鄴嗣在〈黃先生六十序〉中也有這樣一段話：「及子劉子從容盡義，先生日侍其側，年祇三十有五耳。自後晦盲風雨，先生抱戴山之遺書，伏而不出，更二十餘年，而乃與吾黨二三子重論其學，而子劉子遺書亦以次漸出，使吾道復顯于世，有以待後之學者，是則先生之功，固亦劉門之曾子也」。這證明遺書分成兩次而出。等到一六六八年，基本上所有劉宗周的遺書，包括劉洵刪削過的及劉氏的底稿都在黃宗羲手裡了。所以在《南雷文定》〈附錄〉中，有湯斌給梨洲的一封信，上面說：「戊申(1668)承先生賜〈證人會語〉，又得讀戴山遺書，知吾道真傳實在先生」。⁵²

此時黃氏大張旗鼓地復興證人講會，特別表顯師門四項學說：「一曰靜存之外無動察，一曰意爲心之所存非所發，一曰已發未發，以表裡對待言，不以前後際言，一曰太極爲萬物總名」，⁵³引起同門學友們的注意，所以惲仲昇才會專程訪他，希望在對老師思想的詮釋上取得一致。

惲仲昇之同情朱子學風也不奇怪。由其孫惲敬所寫〈遜菴先生家傳〉（遜菴爲惲仲昇字）可以看出，他在成爲戴山弟子前本就是「尤喜宋儒書」的人。⁵⁴他一生以高攀龍與劉宗周爲明代兩位大儒，並修《東林書院志》，編《劉子節要》之體例又顯然仿自《近思錄》，則他對明季王學的放侈應是深所警惕，並同情於比較嚴整有序的朱子學。

前面大略討論了劉門內部轉向朱子學的傾向，接著談當時外在世界由王返朱的壓力，這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官方的態度、一種是學術界返向朱學的傾向及對王學強烈的抨擊。此處先述官方態度之轉變。順治十六(1659)年，也就是惲仲昇著《劉子節要》前十年，順治帝便依楊雍建言，下令將民間有違朱子功令的《四書諸家辨》、《四書大全辨》等書毀板，裨能「廣先賢傳注，不爲異說所奪」。⁵⁵而康熙正式以「御纂」名義下令編朱熹理學精義爲《朱子全書》雖是康熙四十年以後的事，但是，他很早就受熊賜履等人影響而親近朱子學說。

⁵² 《南雷文定》〈附錄〉頁7，收在《梨洲遺著彙刊》（台北：隆言出版社，1969）。

⁵³ 黃炳堃，《黃宗羲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34。

⁵⁴ 《碑傳集》，《清代傳記叢刊》本（台北：明文書局，無出版年代），卷一百二十七，頁29。

⁵⁵ 《世祖實錄》（台北：華文書局，1964），卷一二九，頁1531。

早在康熙十八年，他便與朝臣中王守仁學說的信奉者崔蔚林有過激烈爭論。崔蔚林與張沐、耿介等是當時思想界少數竭力撐持王學的大將。對此，清季李慈銘曾有中肯的觀察：

南方之學，經孝感、平湖二先生提倡，專以尊朱黜異爲第一義，顧應之者多場屋科舉之士，於說書評尾之外，茫然無睹也。北方風氣樸質，士以和平篤實爲務，奉夏峰爲歸宿。而先生（崔蔚林）與潛庵（湯斌）、起庵（張沐）、逸庵（耿介）諸公，群以躬行相飭厲，當世亦拱手宗仰，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⁵⁶

崔蔚林與康熙帝的爭論代表當時固守王學者與官方意識形態之衝突。崔氏主張「格物是格物之本，乃窮吾心之理也」，並質疑「朱子解物作天下之事物，未免太泛，于聖學不切」。當康熙提出說「朱子解意字亦不差」時，崔提出異議說「朱子以意爲心之所發，有善有惡。臣以意爲心之大神明、大主宰、至善無惡。」崔氏所表彰的，其實不是王陽明的意見，而是劉宗周「意」爲純善無惡及「意爲心之所存」的思想，而康熙所主的正是正統朱子學的觀點。十天之後，康熙反駁崔說「天命謂性，性即是理。人性本善，但意是心之所發，有善有惡，若不用存誠工夫，豈能一蹴而至。」數年後，崔蔚林被以言不顧行，居鄉頗招物議，斥爲「所謂道學未必是實」。在他疏請告病還鄉時，康熙還向近臣說他是「直省極惡之人」、「焉有道學之人而妄行興訟者乎」？⁵⁷ 崔蔚林的丟官，實與他和皇帝之間對「意」的爭論分不開。連皇帝都與大臣爭「意是心之所發」？或意是「大神明」「大主宰」？足證這是當時知識界熱門的問題，而且是當時各種朱、王之爭的要點。

至於學術界的壓力，尤以東林爲其代表。顧憲成在東林書院明定「恪尊洛閩」「以朱爲宗」。高攀龍晚年歸里，輯成《朱子節要》，以宣傳朱學爲己任。在顧憲成影響下，東林成員錢一本、孫慎行、史孟麟等都排王而立朱，他

⁵⁶ 《越縕堂讀書記》，（台北：世界書局，1975），頁433。

⁵⁷ 以上爭論原載《康熙起居注》，十八年十月十六日、二十六日，二十一年六月二日，二十三年二月三日，轉引自陳祖武，《清初學術思辨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39-40。

們主張性即理，反對心即理，主張以性善為宗，反對無善無惡之旨，提倡工夫論，反對現成良知說。⁵⁸ 其中高攀龍在明季思想界影響力甚大，而且正是惲仲升所最心儀的學者。

在清初，對王學形成最大壓力的是陸隴其。陸氏以近乎傳教士的熱誠攻擊王陽明學，並極力想將明之覆亡歸罪於陽明學中人。在這一番掃蕩中，陸氏刻意把晚明王學後勁劉宗周拉進來。而他又刻意訴諸新朝大僚中傾向於朱子學的人，並隨時向他們推薦兩部反王學最力的專著：陳建的《學部通辨》、張烈的《王學質疑》。陸隴其對朱學並無任何特別的闡發，不過因他極力鼓倡亦步亦趨地追隨朱子學真面目，所以自然會因劉宗周與朱子相違異而不滿。他的尊朱言論隨處可見，如《三魚堂文集》卷五〈答秦定叟書〉：

今日起敝扶衰，惟在力尊紫陽。⁵⁹

又說宗朱子即是正學，不宗朱子即非正學：

愚嘗謂今之論學者無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者為正學，不宗朱子者，即非正學…今有不宗朱子之學者亦當絕其道勿使並進。⁶⁰

他並且認為朱子與陽明學是處於此消則彼長的關係：

必尊朱子而黜陽明，然後是非明而學術一，人心可正，風俗可醇，陽明之學不熄，則朱子之學不尊。⁶¹

而且他認為明的興與衰，與程朱、陸王的起伏密切相關，故在〈周永瞻先生四書斷序〉上說：

明之所以盛者，程朱之學行也，其所以衰者，程朱之學廢也。⁶²

他對王學的肅清活動，還擴及到許多其實已對王陽明學說採取修正或批評態度的人，譬如高攀龍與劉宗周。⁶³ 只因為他們仍受王學的重大影響，又是明季思

⁵⁸ 以上參考了葛榮晉，〈東林學派和晚明朱學的復興〉，《書目季刊》22：4，頁41-52。

⁵⁹ 《三魚堂文集》，《陸子全書》本，卷五，頁21a。

⁶⁰ 《三魚堂外集》，《陸子全書》本，卷四〈策·經學〉，頁4b-5a。

⁶¹ 《三魚堂文集》，卷五〈上湯潛庵先生書〉，頁4a-b。

⁶² 《三魚堂文集》，卷八，頁4b。

⁶³ 陳榮捷說「隴其不僅攻擊王學，即諸儒思想，依違兩可于朱王之間，亦不肯假借。其時黃宗羲之學盛于南，孫奇逢之學盛于北，李顥之學盛于西，隴其皆不以為然」，見《朱學論集》（台北：學生書局，1982），頁392-393。

想界的領袖，便招致陸氏的激烈攻擊。其中尤以劉宗周為主要目標。茲先引《三魚堂日記》中數條為證。戊午年(1678)八月間，陸氏開始讀劉氏的〈學言〉，便處處不滿。後來又引宋崑友的話說蕺山之學太「僻」，只因「念台年少登科無人敢駁他，故至於此。」陸氏《文集》中甚至說：

…學術之害，其端甚微，為禍最烈…當今之世，有能真實為陽明之學者，其賢於庸惡隨劣之徒，相去不萬萬耶？何為其議之也。至於陽明之後，如梁谿、蕺山，皆一代端人正士，而其學亦有不可解者，名為救陽明之失，而實不能脫陽明之範圍，其於朱子家法，亦盡破壞，每讀其書，未嘗不重其人而疑其學。⁶⁴

這裡陸隴其說高攀龍、劉宗周名為救陽明之失，其實不能脫陽明之範圍，尤其是破壞朱子家法，使他大為不滿。在清初如想立朱子學為正統，主要的清除對象不是王陽明，而是高攀龍、孫奇逢、李顥、劉宗周、黃宗羲等人，尤其是高攀龍與劉宗周。

在明清嬗代之際，蕺山一派獨盛。而在陸隴其之前，王學早被攻擊得體無完膚，應撫謙的《性理大中》將王陽明一生行跡逐細批評。孫承澤更引陽明同時代人之說，責王氏一生皆是「作用」，也就是多機權而無大本大源。連劉門弟子張履祥也說《傳習錄》一整本是「驕」、「吝」二字的表現。但是，攻擊劉宗周則是一件新工作。一方面是因為劉氏一派獨盛，另一方面是：劉氏其實已是王學轉向的代表性人物，這個時候左派王學狂放之風早已不存在，劉氏身上表現的是艱苦修養的功夫，所以攻擊他即代表不但是對王學，同時也是對王學修正派的徹底肅清。⁶⁵ 而攻擊高攀龍則是對東林一派的整肅。東林顧憲成、高攀龍為批評王學之代表，一提性善，以破無善，一倡格物，以救空知。⁶⁶ 其中尤以高攀龍在清初思想界最有地位。⁶⁷ 但是在純正朱子學者看來，他們仍未真正脫離陽明矩矱。

⁶⁴ 《三魚堂文集》，卷八，頁4b。

⁶⁵ 當時也有人反對陸隴其對高攀龍、劉宗周的攻擊，湯斌及彭定求皆曾遺書爭之，見彭紹升，〈故四川道監察御史陸清獻公事狀〉，《二林居集》（光緒七年刊本）卷十五，頁16a。

⁶⁶ 《清學案小識》（台北：商務印書館，1975），頁91。

⁶⁷ 譬如刁包（用六居士），便是因為篤好高氏之書而「遂置主奉之，偶有過舉，必展謁悔謝，曰：某不肖，甚愧吾父師，不可為子，不可為人」。《明遺民錄》，頁15。

陸隴其闢陽明申朱子最重要的兩件著作是〈學術辨〉及〈與湯公潛庵（斌）書〉。而在給湯斌的信（寫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中他說：

蓋天下有興起之師，廉頑立懦，能拔人心於陷溺之中。成德之師，切磨琢磨，能造人才於精粹之地。使以興起之師，而遂奉為成德之師，則偏僻固滯，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如梁谿、蕺山，以之興起人心則有餘，以之成就人材則不足，其學亦恐不可盡宗也。⁶⁸

陸氏認為高、劉二人可以為興起人心之師，但非成德之師。在高、劉二人中，陸氏專門攻擊劉宗周的言論較多。如康熙十七年(1678)，左峴對陸隴其說及江浙一帶學者，皆宗山陰（劉宗周），陸隴其除嘉許左氏雖是鄞人，而能「不惑於山陰蕺山一派，可敬也」，並且說：

自羅整庵痛言象山、陽明之後，如高景逸、劉念台，皆不敢復指心為性，但心性之辨雖明，亦不過謂心為氣而性為理，心之中有性，而性非即心云爾，其欲專守乎心，以籠罩夫理則一也。特陽明則視理在心外，高、劉則視理在心內，高則以靜坐為主，劉則以慎獨為主…。

又說：

山陰之學，其病只在不知朱子所謂「析之極其精，合之盡其大」二語，故朱子分八條目，而山陰則以誠意為了義，曰「致知致此也，格物格此也」。朱子以主敬置八條目之外，而山陰則以誠意當主敬。⁶⁹

高、劉二氏被處處「求合於朱子」的惲仲昇推崇為「正學」，但卻被陸隴其一概否定，此間曲折只有從一個長程思想發展角度才能了解。對惲仲昇來說，高、劉代表一種轉向；但在陸隴其這位純粹朱子學的捍衛者來說，他們是轉步矣，但尚未移身。陸氏在《日記》中，又處處將對黃宗羲的不滿與對劉宗周的批評連結起來。如：

閱黃太沖文，知山陰之學，其病只在不知。⁷⁰

⁶⁸ 《陸稼書先生年譜卷上》，在《陸隴其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99。

⁶⁹ 《陸稼書先生年譜卷上》，同前書，頁58。

⁷⁰ 《三魚堂日記》（台北：商務印書館，1971），頁66。

又說他閱讀黃氏的《明儒學案》六卷，「而議論不無偏僻，蓋以蕺山一家之言，而斷諸儒之同異，自然如此。」並說「太沖尊之（劉宗周）太過，所以多費周旋。」依《年譜》，這段話是康熙二十年(1681)對仇滄柱所說的。⁷¹

陸氏還針對黃宗羲作了很多批評：

閱孫徵君年譜。歎近年來南方有一黃梨洲，北方有一孫鍾元，皆是君子，然天下學者，多被他教得不清楚。⁷²

依《年譜》知這是陸氏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意見。他並且舉黃氏在家鄉「不滿于眾口」進行人身攻擊。黃氏是與陸隴其同時代，而獨領江浙一帶學壇風騷的王學代表，所以陸氏以他為箭靶不是沒有理由的。

在討論過陸隴其對王、劉、黃之學的攻擊之後，我們回過頭來檢討乾隆年間《國初人傳》一書對於王、朱學術之更迭的觀察是否正確。《國初人傳》其書不傳，其作者亦不詳，照李慈銘說，應該是作於乾隆中葉。由於他是乾隆時人，故他的觀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處。此處將作一些辨證。李慈銘在讀過《國初人傳》後，說其論學「頗左右于陽明蕺山」。⁷³ 該書在〈劉伯繩先生傳論〉上說：

蕺山之學，大約圭臬文成，而時有匡拂，具補偏救弊苦心。至考亭一脈，要未嘗規規也。堅守《集註》者，如孫退谷、陸稼書嫌其不合，即以張弧文成者，集矢蕺山，持鋒甚厲。先生乃不能自信，陰加竄易，附合考亭，日初仲昇助之，黃梨洲稱為三家村學究定王會圖，諒哉。⁷⁴

作者認為孫承澤（1592-1676或1593-1675）、陸隴其以朱子學為宗旨，攻劉宗周，引起劉灼及劉氏門人的恐慌，所以決定將劉氏文集中有違朱子的部份刪去。

梁啟超曾在《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孫承澤是明清之交排陸王派的「頭一個領袖」。⁷⁵ 孫承澤著作有百種之多，可是與思想有關者多極難得。中央圖書館

⁷¹ 《陸稼書先生年譜》卷上，在《陸隴其年譜》，頁82。

⁷² 《三魚堂日記》，頁115。

⁷³ 《越縕堂讀書記》，頁429。

⁷⁴ 同前書，頁429。

⁷⁵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中華書局，1975），頁104。

藏有兩種：《宋五先生學約》十四卷（共二冊，係清康熙間北京孫氏清稿本）及《考正晚年定論》（一冊，鈔本）。前者是一部選集，他自道「余閉戶十四年以來，無日不讀五先生之全書，而於《近思錄》、《節要》（案：高攀龍，《朱子節要》）二書尤未暫時釋手，雖間讀呂仲木先生五子之《抄釋》，張南軒先生二程夫子之《粹言》，丘文莊《朱子學的》等編，然未及如《近思》、《節要》二編之書專且久也。今行年七十有四，恐一旦風燭，迺合二編稍加裒益，爲《學約》一書」。⁷⁶

至於《考正晚年定論》，其宗旨在該書的「序」中已表達得相當清楚。他說「考正者，考正其（王陽明）謬也」。「如謬以朱子爲支離，如晚悔——則是吾夫子所謂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文約禮，刪述《學》《易》俱早年之支離，必如無言、無知，無能爲晚年自悔之定論也。」他又從心術上批陽明說「繼津王大司馬則嘗言之矣。繼津嘉靖中爲紹興司理，備知陽明立身居家無實學，智術籠罩，每曰，此君只是作用。」「陽明有何不得已？甚哉！無所不用其作用也。學問而至於作用，陸子靜狂率尙不屑爲，而宗子靜者肆然以爲得計乎」。⁷⁷這兩部文字一推闡北宋思想，一打擊王陽明，而且下筆極不客氣。⁷⁸

當時與孫承澤相應和者有魏象樞，葉方藹，熊賜履，張幹臣。但他們常聚在一起倡朱攻王的時間是康熙十七年(1678)前後。⁷⁹當時《劉子節要》早已撰成，劉伯繩也已謝世。所以《國初人傳》中說孫承澤「以張弧文成者，集矢蕺山」以致劉伯繩、惲仲昇「不能自信」，乃對劉宗周的文集「陰加竄易」，是不可能的。孫承澤兩份最有影響力的文字，《宋五先生學約》，作於1666年、《考正晚年定論》，作於1673年，⁸⁰這些文章雖出現較早，也不太可能影響到劉伯繩的編輯工作，及惲氏的《劉子節要》。

⁷⁶ 《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台北：中央圖書館，1993），子部一，頁209。

⁷⁷ 同前書，頁207-208。

⁷⁸ 討論孫承澤思想的文字極少見，閻崇年有〈清代史壇大家孫承澤述論〉，在《燕步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頁179-198。

⁷⁹ 《陸稼書先生年譜》，在《陸隴其年譜》，頁50-75。

⁸⁰ 以上參見王崇簡，〈光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吏部左侍郎孫承澤行狀〉，《碑傳集》卷十，頁14。

至於陸隴其，則不但年輩晚於劉、惲二人將近二、三十年，而且當他思想成熟時，早已過了劉子文集之纂輯及《劉子節要》編定的時間了。雖然說陸氏從束髮受書，即知崇尚朱子，並深惡講學家之背《四書集注》，⁸¹但他堅定反王學是在四十歲左右(1670)的事。據私淑他的吳光西所輯《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記載，直到四十歲左右，陸氏還在朱、王之間徘徊，到四十三、四歲時因結識呂留良，受張履祥、呂留良之影響，才堅定對朱子學的信仰。這可以從他康熙二十二年祭奠呂留良的文字看出——「某不敏，四十以前，以嘗反復程朱之書，粗知其梗概，繼而縱觀諸家語錄，糠粃雜陳，珉玞並列，反生淆惑，壬子、癸丑，始遇先生，從容指示，我志始堅，不可復變」。⁸²那麼，他堅定排王之時，劉洵早已死了，而《劉子節要》也早已刊出，而他最早最重要的釐清學脈文字，如〈學術辨〉上中下三篇，作於一六七八年，正是惲仲昇的死年，則劉、惲更不可能受其影響了。

孫承澤年輩較陸隴其為高，但是兩人為了反王尊朱而聲氣相求，《國初人傳》的作者說「詆戢山者，肇端於宛平孫承澤，前此未有也，而平湖繼之。承澤行徑不足道，平湖集中載有〈上孫退谷先生書〉，尊之何啻碩儒魁德，豈喜其意見之同，忘其律身之汙乎？」⁸³今本陸隴其文集中並無〈上孫退谷先生書〉，或許在原刊本中有這封信，而《國初人傳》的作者讀過它。俟考。⁸⁴

劉門後學向朱子學的轉向，不但反映在惲仲昇所編的《劉子節要》，也反映在編纂劉宗周文集時的去捨上，不但發生在劉宗周兒子這一輩，也發生在他的孫子輩身上。劉宗周的孫子刪節其祖父著作的情形，《國初人傳》中〈黃梨洲先生傳論〉描寫道：

⁸¹ 《陸稼書先生年譜》卷上，在《陸隴其年譜》，頁30。

⁸² 《陸稼書先生年譜》，卷上，同前書，頁95。

⁸³ 《越縕堂讀書記》，頁429。

⁸⁴ 關於陸隴其文集，雷夢水說：「陸隴其所著《三魚堂文集》以康熙間嘉會堂原刊初印本為最善。后印本因為文字獄的關係已刪掉〈答呂年黨〉、〈與呂年黨及附答〉、〈祭呂晚村先生文〉等篇。」見傅振倫，〈鄧師之誠先生行誼〉，《鄧之誠先生學術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頁37。

戴山遺書，皆嗣君伯繩所綴輯，於戴山之言有與洛閩齟齬者，輒加竄改，而其孫子之又甚之。予嘗親見藏稿本，三人之手跡劃然，則伯繩父子不得為無過矣。先生（指黃宗羲）謂昔之人不敢以燭火之光，雜於太陽，今之人乃欲以天漢之水，就其蹄涔，不亦異乎？⁸⁵

據該作者的報導，他親見劉伯繩父子兩代陸續刪改劉宗周遺著以求合於朱子學說的原跡。由「而其孫子之又甚之」一句，正見劉洵之子比其父更為激進，刪竄得更厲害。此處的子之是一個錯誤，應該是子志，即劉士林。雖然他們刪改的原稿已不得而見，但我們從另一條線索多少可以證實此說。

我很懷疑：世傳劉伯繩死後，他所著劉宗周年譜有改本之事也與劉士林有關。章學誠在《章學誠遺書》中的〈劉忠介公年譜敘〉中說「惟年譜草稿，成於先生之子劉伯繩，閱世既久，子孫自為書，詳略異同，未能劃一」。⁸⁶弟子董瑒在編《劉子全書》後於卷首〈抄述〉部份中也說他見過兩種年譜，是不懂得劉氏「意」之哲學的人所為。他說在劉洵歿後

錄得譜稿二本，一曰《先君子戴山先生年譜》，中多竄抹，傳自學人不會誠意宗旨者為之，至不可認。一曰《劉忠正公年譜》，與前本大同小異。⁸⁷

董、章兩人都在說年譜方面改竄之事。但董瑒年代較早，他明白指出劉伯繩死後，出現兩種年譜，而且內容基本上相近，其中一本名為《先君子戴山先生年譜》，是劉洵所編，而另一本題《劉忠正公年譜》者，只是對前者稍加改變，故說是「大同小異」。至於章學誠所說的「閱世既久，子孫自為書」，顯然他還見過另一本《劉忠介公年譜》，在原稿上有子孫自改的痕跡。劉洵並無兄弟，所以對於年譜的種種刪改也只可能出自其子孫之手。

劉洵的兒子共有四人，劉茂林（子本）、劉士林（子志）、劉長林、劉道林，而長子劉茂林是黃宗羲的次女婿。因為他是宗周長孫，故能擁有劉氏遺稿，而黃宗羲是從他手中取得原稿重新編定劉子全書。劉士林是另一位對其祖父思想感到興趣的人。至於劉長林與劉道林，則沒有任何相關文字留下來。我

⁸⁵ 此傳不得見，轉引自李慈銘，《越縕堂讀書記》，頁432。

⁸⁶ 章學誠，《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207。

⁸⁷ 《劉子全書》，頁123。

們有理由猜測，劉茂林兄弟對於其祖父思想之詮釋，至少應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是遵循黃宗羲的途轍，劉茂林即是。《清史列傳》中說他「幼侍宗周，聞慎獨之旨，既長，移居證人書院，靜驗獨體，闡用絕學，與外父黃宗羲復興證人社，講學不輟」。⁸⁸ 因為他思想本來就與黃氏相近，後來又作了他的女婿，所以他會同意將劉宗周遺稿拿出來交給黃宗羲。另一派則反對黃宗羲的詮釋，劉士林即是。他的思想和父親劉洵較為相近，所以其父所整編的劉宗周遺書便交給他收存。⁸⁹ 《劉忠正公年譜》或許即出自他的手筆。劉茂林與劉士林思想相左，關係也不睦，《陳確集》中有一封在劉洵初喪時寫給張履祥的信間接說明了他們兄弟之不合：

子本兄弟間既翕與否，念之痛心。⁹⁰

而他在給劉茂林的〈與劉子本書〉中也表示：

前辱手書，知友於之情，未甚和協。⁹¹

在這封信中，他又說：「祖父相承道統擔子，在子本一人身上」，⁹² 足見他認為劉茂林應該是劉宗周思想的傳承者。

劉士林卒年不詳，其生年應為一六三九，我們知道一七〇九年時他還健在，如果說受陸隴其的影響而改竄劉宗周文字，也應該是劉士林這一輩，而不是劉洵及惲仲昇。劉士林是否改年譜一事，目前只能推測，不過，他為其祖所寫的〈行實〉（〈先大父榮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念台府君行實〉）確實將其祖思想中「意」與《人譜》兩部份盡行省略。《行實》被收入《劉子全書》的《遺編》中，通讀一遍，我們確實可以了然於他如何地省略其祖父明顯與朱子思想相違的部份。《行實》對這些問題通篇不著一字，使得讀者並不覺劉宗周有這方面的思想。⁹³

⁸⁸ 《清史列傳》（上海：中華書局，1928）卷六十六，頁11。

⁸⁹ 《劉子全書》，〈抄述〉，頁91。

⁹⁰ 《陳確集》，頁131。

⁹¹ 同前書，頁134。

⁹² 同前書，頁134。

⁹³ 《劉子全書及遺編》（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頁1299-1325。此文年代不可考。

早在陸隴其以傳教士般的熱誠四處宣揚反王學的主義時，他便察覺當時有一修改王學以求合乎程朱的風潮了。《三魚堂日記》中有一條說：

昔之爲王學者，樂其病，今之爲王學者，掩其病。⁹⁴

他所描述的是一種自覺、或不自覺地修改作品以求合於當時思想界主要趨勢的舉動。但是堅守劉氏之學的人，對這種作法並不滿意，在劉伯繩、惲仲昇歿後，黃宗羲與董瑒、姜希轍三人重加編纂。黃氏的〈先師戴山先生文集序〉中說：

王顥庵先生視學兩浙，以天下不得睹先師之大全爲恨，捐俸刻之，浙東門人之在者，義與董瑒、姜希轍三人耳，於是依伯繩原本，取其家藏底草，逐一校勘，有數本不同者，必以手蹟爲據，不敢不慎也。⁹⁵

黃氏等依劉宗周原稿，將劉伯繩等所刪改部份補正回去，而董瑒是實際負責的人。⁹⁶ 董瑒認爲應該以劉宗周原稿爲準，他並且認爲黃宗羲真正能傳其師之原旨。⁹⁷ 至於王顥庵是指王掞，江南太倉人，康熙庚戌進士，錢大昕《潛研堂文

⁹⁴ 《三魚堂日記》，頁127。

⁹⁵ 《黃梨洲文集》，頁348-349。

⁹⁶ 邵廷采《東池董無休先生傳》：「既國變，遂棄舉子業，斷髮假緇衣，錄戴山《劉子全書》，誡其子學在居敬，能守《曲禮》，由是而之程朱之門不遠矣。」；「作《記日書》念過，與《人譜》一編表裡。自戴山完節後，證人之會不舉者二十年，先生謂道不可一日不明，後生生今日，不幸失先民餘教，出處輕而議論薄，由學會之廢也。善繼述戴山志事者，亟舉學會，後請戴山高第弟子張莫夫、徐澤蘊、趙禹功諸前輩集古小學，敷揚程朱王劉家法，于是餘姚黃梨洲、晦木，華亭蔣大鴻，蕭山毛西河，皆挈其弟子自遠而至。」；「康熙甲寅(1674)避寇入郡，始謁先生，詔以既宗戴山之人，不可不知戴山之學，後數年負笈，喜讀《全書》，見其楷書詳註，條分眉列，惟恐有失師門之真，其莊慎如此」(《思復堂文集》，台北：華世書局，1977，頁354-356)。

⁹⁷ 董瑒是支持黃宗羲，並認爲只有黃氏能傳其師之原旨的。他說梨洲黃氏有《劉子學案》之刻。他作序，序曰：「先師劉子，自崇禎丙子(1636)在京日始訂誠意之旨以示人，謂意者心之所存，戊寅(1638)瑞生侍師，親承音旨，時聞者謂與朱子王子不符，起而爭之，其問答之語，往復之書，備載《全書》，瑞生心識是說，未敢有所可否，一時門人後學，亦未有會之者。先師沒後，梨洲黃子特闡其義，見於序牘，余亦不敢出一詞以應，逮先師辭世三十八年，得一菴王氏棟《遺集》，內有〈會語〉及〈誠意問答〉…不知前此已有不謀而同焉…而學者顧無真詣，援而他附，黃子於生平所得，合之《全書》，精討而約收之，總以標挈斯旨，此真先師不絕之微言也。」(《劉子全書》，〈抄述〉，頁155-7。)同文中又說：「黃子之有功於師門也，蓋不在勉齋下矣！世有願學先師者，其於此考衷焉。」(頁158)

集》、袁枚《小倉山房詩文集》、王昶《春融堂集》中都有他的傳。他們都提到他曾視學兩浙，錢大昕的〈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王公揆傳〉中還稱道說他因在浙江取士公允，而有「窮通翁」之美稱。不過，以上傳文皆未提到他視學浙江的確切年代。但黃炳堃所寫《黃梨洲先生年譜》康熙二十六年(1687)條下則有「王顥庵督學刊《子劉子文集》」。⁹⁸ 當時劉伯繩已卒甚久，故黃氏三人才可將他家家藏的稿子取來逐一校勘，重新補入。黃炳堃在《年譜》上說：

公取家藏底草與伯繩先生原本公次女婿茂林，念台先生冢孫也，逐一校勘，必以手蹟爲據。⁹⁹

當時黃氏已七十八歲，編校劉宗周文集，算是晚年最重要的事業之一。這個新編本是對劉洵本的一次大反攻，除了言「意」等哲學上的論辯外，對劉宗周一生事蹟的詮述也不放過。據親見「錄本」的董瑒說，劉洵之「錄本」原有惲仲昇所撰的劉子行狀，董氏在編全書時，卻易之以黃宗羲的一篇〈子劉子行狀〉，¹⁰⁰ 這自然是有特殊用意的。因為惲氏所撰的行狀並不忠於劉氏的意之哲學，而黃宗羲的〈子劉子行狀〉中對劉宗周「意」的哲學作了非常忠實的闡發。全祖望〈題惲氏劉忠正公行實後〉說：「〈行實〉一篇最詳盡，惟言意爲心之所存，則遜庵有不盡守師說者，故梨洲別撰〈行狀〉一篇」。¹⁰¹

即使連劉洵所作年譜，董氏也「以忠正譜爲正，而註以先君子譜之不同者，間有一、二隱而未揭，散而無紀者，小爲訂之，亦即伯繩氏未發之意也」。¹⁰² 所謂「隱而未揭，散而無紀」者，主要的一個便是「意」方面的哲學。我們已不能得《先君子譜》及《忠正譜》兩種年譜合併而觀之，不過根據看過它們的董瑒的評斷：是「不善會誠宗旨者所爲」，我們可以推斷，〈年譜〉中是模糊、或竟不談「意」方面的哲學。在〈年譜〉崇禎九年條下，這樣的形跡尤其明顯。董氏在〈抄述〉中說：

⁹⁸ 黃炳堃，《黃宗羲年譜》，頁45。

⁹⁹ 同前引。

¹⁰⁰ 〈抄述〉，《劉子全書》，頁121。

¹⁰¹ 全祖望，《鮚埼亭集》（台北：華世書局，1977），外編，卷三十，頁1083。

¹⁰² 〈抄述〉，《劉子全書》，頁124。

崇禎丙子(1636)在京日，始訂「誠意」之旨以示人。¹⁰³

可是《劉子全書》中的〈年譜〉崇禎九年丙子條下卻將劉子「意」方面的哲學闡發得相當清楚，¹⁰⁴此應即「小爲訂之」的部份了。

董氏在編書時，極爲小心，而且顯然處處想昭信於天下讀者，所以他對劉氏遺稿情形提供了一篇極爲清楚的第一手報導，現在讀來，幾乎便是一篇手稿狀況的報告。他處處談到「錄本」——即劉洵所編定本，及他所編本子之間取捨的不同，以及「錄本」與「底本」——即劉宗周之原稿本之間的出入。這些出入有些在後人看來極爲細瑣，可是在當時卻關涉到劉戴山學派內部的爭論。

由這篇報導中，可以略知劉洵如何刪去其父誠意的宗旨。董瑒在〈抄述〉——也就是校訂文稿的記錄中，做了一些比較。如說：

（〈學言〉）底本五百七十餘條，而錄本缺二百餘條。底本於錄本未收者，額誌以殊，是分識之，將並存之也。而錄本以「只此一心」條爲冠，此心論也。¹⁰⁵

又說：

如子以意爲心之所存，其論似翔，當時學者如董標，史孝復輩驚爲異說。然朱子嘗有「意是情專所主時」語，敬齋胡氏亦云「心有專主之謂意」，《大學》解以爲心之所發，恐未然，特語焉不詳，瑞生守其說不敢以告人。距子辭世三十八年，得泰州王氏門人王一菴先生棟遺集二冊讀之，內有〈會語〉及〈誠意問答〉，所言與子恰合。子曰：「意者心之所以爲心也，止言心只是虛體耳，著個意字，方見下了定盤鍼，有子午可指。然定盤鍼與盤子終是兩物，意之與心，只是虛體中一點精神，仍只是一個心...」。¹⁰⁶

又說：

...今爲更正，而照底本補存九十二條，訂十二條...，並證以一菴氏之說，

¹⁰³ 同前書，頁155。

¹⁰⁴ 同前書，頁3607。

¹⁰⁵ 同前書，頁98。

¹⁰⁶ 同前書，頁99。

使知意之所存一語標揭尼山秘旨，於二千一百餘年之後，又有遙相契合者，非爲異說，子之苦心，庶不終晦…。¹⁰⁷

由以上幾條可見董氏在校勘時，把原先被竄改的部分再度改回來。¹⁰⁸

現在行世的董場所編《劉子全書》本，即是就王揆所資助，黃、姜、董三人所編的四十卷本加以重訂後的本子，不過重訂的時間已不可考。一般認爲，它比王揆刻本更加詳慎，這個訂本應是在清代文網已開始之時，故凡提及明末清初史事者，多予刪削。¹⁰⁹

值得注意的是：刪改文獻以求合於新復興的朱子學，不只發生在對劉宗周思想系統的詮釋與取捨上。張履祥輯劉宗周修正陽明的話爲《劉子粹言》，這是由王轉朱之第一步，而張伯行更把陸世儀（桴亭，1611-1672）這位王學修正派的《思辨錄》「刪訂一番，必須與程朱相合的話始行錄入」，則是更進一步了。¹¹⁰

以上論述大致可分成兩部份。第一是《劉子節要》的編集工作所反映的思想史意義。第二是劉灼及他的子輩就劉氏遺集及年譜所作的改削所反映的意義。我反駁了乾隆中期無名氏《國初人傳》中的推斷，在作了若干釐清之後，我們應說，發生在惲、劉二人身上的，代表劉門內部當時之分化（也就是王門之分化），可以約略分成五派。第一是自認忠實於蕺山之學的黃宗羲一派。第二是走入狂禪一派。第三即是惲、劉所代表的修正派。第四是張履祥所代表的由王

¹⁰⁷ 同前書，頁103-104。

¹⁰⁸ 「如答董生心意十問之第四條底云：心不可以已發言，而《大學》之言心也則近之。上既有已發字，故下但言近之。且近之字法甚活，而改之則云『多從已發』，重出而又死煞矣。」（同前書，頁147）

「又云正之爲義如云方方正正有倫有脊，與中字不同。中以心言，正以事言也。借中字以通解正字、心字，對事字非對意字也，而改之則云與誠字不同。誠以體言，正以用言，故正心先誠意，由末以之本也…」（同前書，頁148）。

他又說：「憶子辭世後，有持子書欲爲更定句字者，商於埽雲徐氏。埽雲曰：『如此則是君之書，非先生之書矣。』」（同前書，頁148-149）。

¹⁰⁹ 詹海雲，《劉蕺山的生平及其學術思想》（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頁231。

¹¹⁰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99。

返朱派。第五是陳確，他根本不認為以上諸派所爭的問題有任何意義。第三、四是比較相近的兩派。而由戴山的兒子帶頭將他們老師最大的思想創獲刪除，以求合於朱子學，最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派受晚明東林顧、高之學影響甚大，能欣賞朱子學，不過思想底子仍不出王學範圍。他們與孫奇逢、李顥等相近，雖然修正了王學，但並不斷然主張朱子學獨一無二的排他性地位。一直要到戴山另一弟子張履祥，才於數次轉變之後，決定獨宗朱子。

清代士人攻擊朱子的風氣甚盛，¹¹¹ 這一方面討論者已多。本文想指出的是在惲、劉二人之後，學界有兩種發展，第一、是激烈攻擊王陽明及劉宗周的文字大量出現，而反王學的人集結在一起，既有皇帝的支持，又有科考宗朱注的幫助，他們四處與人爭論，務必要使反朱子學的人放棄原有的觀點，同時，對朱子學直接孔孟正統地位作了最突出的宣揚，將之推尊為獨一無二的、具有排他性的聖道代表。在樹立朱子排他性地位與澈底打垮王學的過程中，他們對王學修正派，或依違兩可，主張調停朱王的人，發動激烈的攻勢，所以一批在清初極有勢力的思想家都遭池魚之殃，這是孫承澤與陸隴其的貢獻。他們辭鋒極厲，幾乎不容對方有反駁的餘地。第二，思想之外還挾功名之誘惑，而當時幾位尊朱的思想家又是有名的治臣，所以朱子學興起，非常之快。理學大儒中只有孫奇逢、崔蔚林、湯斌、耿介、張沐、彭昀庵等人還為王學說話，但聲光已淡。到了康熙十八年，康熙皇帝與崔蔚林的一次公開辯論之後，這一派的力量被官方重挫。這時對劉宗周批評得相當厲害，可能逼使劉氏後代改削劉氏文集，及劉洵所編的劉子年譜，刪去「戴山之言有與洛閩齟齬者」，以合時風眾勢。清代統治者在經過多年的搖擺之後，決定以朱子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根據，康熙帝對王學陣營的敵對態度，一次比一次堅決，對朱子的崇信，也愈來愈具有排他性。這一發展過程，其實是與思想界一步一步肅清王學並凸出朱子排他性地位的趨勢平行發展。由此可略窺清代官方意識形態成立的大概。

（本文於民國八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通過刊登）

¹¹¹ 何佑森，〈近三百年朱子學的反對學派〉，《幼師學誌》16：4（1981.12），頁25-35。

引用書目

一、文獻史料

- 《世祖實錄》，台北：華文書局，1964。
- 《南雷學案》，《清代傳記叢刊》本，台北：明文書局，無出版年代。
- 《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序跋集錄》，台北：中央圖書館，1993。
- 《清史列傳》，上海：中華書局，1928。
- 《碑傳集》，《清代傳記叢刊》本，台北：明文書局，無出版年代。
- 《劉子全書及遺編》，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
- 九州學哲學部編，《傳習錄索引》。
- 吳光西等，《陸隴其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3。
- 全祖望，《鮚埼亭集》，台北：華世書局，1977。
- 汪憲編，《振綺堂書錄》，民國十六年排印本。
- 李慈銘，《越縕堂讀書記》，台北：世界書局，1975。
- 李鄴嗣，《杲堂詩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 呂留良，《呂晚村文集》，台北：商務印書館，1977。
- 吳 蕃，《祗欠菴集》，民國適園叢書本。
- 邵廷采，《思復堂文集》，台北：華世書局，1977。
- 袁爾鉅，《蕺山學派哲學思想》，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3。
- 紀昀等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1。
- 孫靜菴，《明遺民錄》，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 徐世昌，《清儒學案》，台北：世界書局，1979。
- 章學誠，《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 陳祜乾編，《黃梨洲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
- 陳 確，《陳確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 陸隴其，《三魚堂文集》，《陸子全書本》。
- 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台北：商務印書館，1971。
- 陸隴其，《三魚堂外集》，《陸子全書本》。
- 黃宗羲，《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5。
- 黃宗羲，《黃宗羲全集》，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1994。

- 黃宗羲，《梨洲遺著彙刊》，台北：隆言出版社，1969。
黃炳堃，《黃宗羲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3。
彭紹升，《二林居集》，光緒七年刊本。
劉宗周，《劉子全書》，台北：華文書局，無出版年代。
蔣學鏞，《鄧志稿》，四明叢書，第三集。
謝國楨，《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二、近人著作

- 何佑森，〈近三百年朱子學的反對學派〉，《幼獅學誌》16：4（1981，12）。
徐益藩，〈黃梨洲呂晚村爭澹生堂書平議〉，《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3：1（1947）。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中華書局，1975。
陳祖武，《清代學術思辨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陳榮捷，《朱學論集》，台北：學生書局，1982。
傅振倫，〈鄧師之誠先生行誼〉，收入《鄧之誠先生學術記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葛榮晉，〈東林學派和晚明朱學的復興〉，《書目季刊》22：4。
詹海雲，《劉戡山的生平及其學術思想》，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
閻崇年，〈清代史壇大家孫承澤述論〉，收入氏著《燕步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
謝巍編撰，《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北京：中華書局，1992。
戴君仁，〈心學家論意〉，《大陸雜誌》44：4。

王汎森

New Intellectual Trend in the Early Ch'ing Period and the Compilation Project of *Liu-tzu-chieh-yao*

Wang Fan-se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While reading the preface of *Ming-ju-hsüeh-an*, many people will soon be baffled by a paragraph describing a serious quarrel between Huang Tzung-hsi and his friend Yün Chung-sheng about a book compiled by Yün entitled, *Liu-Tzu chieh-yao*. The book is, in fact, not extant. However, this article try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appearance of this text reflects a major transition in the intellectual world of the early Ch'ing period.